

孔學新論

● 趙光賢 著 ●



巴蜀書社

序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名望最高、影响最大的人物，同时也是争议最多的人物。孔子生前已有人称之为“圣者”，同时也受到一些人的讥评。到战国时代，墨家、道家、法家都曾对孔子提出激烈的訾议；但是，在诸子之中，孔子还是名望最高的。著有《问孔》篇的王充，也承认“孔子，诸子中最卓者也”。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孔氏，其后历代统治者都尊崇孔子，“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因而起了束缚人民思想的消极作用。然而这不能由孔子负责，不能归咎于孔子。孔子的学说对于中华民族的精神文明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起了促进精神文明发展的积极作用，这才是事情的主要方面。孔子的学说当然有其时代的局限性，但也有许多观点至今仍具有显著的生命力，至今犹能给人以深切的启迪。

近十年来，摆脱了“尊孔”与“批孔”的纠缠，对孔子学说进行客观性全面性探讨的论著已经不少，这是可喜的。赵光贤教授是史学名家，对于中国古代史研究做出过卓越的贡献，成就宏巨，近著《孔学新论》一书，对于孔子学说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考察分析，表现了高度的科学性。书中对于孔子“仁”学的含义以及

仁与礼的关系、孔子与六经的关系都提出明锐、深刻的见解。书中提出许多精辟的论断，如说“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特点有二：一是现实主义的人生哲学；另一是集体主义的社会哲学”。更进而指出：“孔学把政治、道德和教育看成三位一体的、密切而不可分”。这些见解具有科学的准确性和深刻性，令人敬佩！书中亦谈到孔子与老子的关系以及孔子与《易传》的关系，比较同意疑古派的观点。这些问题学术界有不同意见，不妨各尊所闻，不必强求一致。至于关于孔子与《诗》、《书》以及《春秋》的关系，书中进行了不少新的考察，实多发前人所未发，我读后甚为赞赏！光贤同志以书稿见示，我十分欣喜！捧读之余，爰述所感，提供读者参考。是为序。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

张岱年于北京大学

目 录

张 序	(1)
一 孔学与儒学(代序)	(1)
二 孔子的生平简介	(10)
三 春秋末期鲁国统治阶级内部斗争和 孔子的阶级立场	(23)
四 孔子的政治学说	(39)
五 孔学的核心“仁”及“仁”与“礼”的关系	(52)
六 孔子的方法论	(71)
七 孔子与六经	(92)
八 孔学在战国秦汉时期的传人	(107)
九 孔学在我国传统文明中的地位	(127)
十 孔学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135)
十一 如何正确理解和评价孔子	(149)
后记	(166)

一 孔学与儒学

(代序)

在文化界、思想界人们经常谈论这样一个问题，即在走向社会主义的路上，如何处理我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大家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的儒家思想？有人说：“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这样原则性的话容易说，具体做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首先，儒学从孔子创立以来，到了战国时期，就分孟、荀两大派，虽都推尊孔子，但在具体问题上往往对立。汉代则有董仲舒的神化的儒，魏晋有老庄化的儒，宋代有程朱的理学，宋明有陆王的心学，都打着孔子的旗号，而各有各的理论。实际上他们只能算是儒家的一派，而与孔子学说都有一定的距离。于是有人提出来，儒学应当现代化，以适应今日的社会。现今在大陆与海外都有新儒学出现，虽然主张并不相同，但用西方哲学家的唯心哲学重新解释孔子或其他儒者则是一致的。我以为儒学这样现代化就等于创立新的学派，而不能算是儒学，特别不是孔子之学了，所以这个问题值得认真讨论。

（一）“周公仲尼之道”

如果说西方文明始于希腊，而希腊哲学的诞生又从自然哲学开始，到苏格拉底才转而研究人生哲学和社会哲学，那么中国则正相反。中国远古之世，除原始宗教迷信外，很难说真正哲学思想从何时开始。《尚书·周书》中周公多次谈到“天命”，但它与后世说的“天道”不同。周公在《多方》、《多士》篇中对殷人说，周之代殷，正如殷之代夏，是奉上帝之命，不是周人与殷人为敌。这是安抚殷民的外交辞令，顶多不过承认上帝的存在，与“天道”无关。反之，周公在东征武庚、管蔡之乱以前说：“予永念曰：‘天维丧殷；若穡夫，予曷敢不终朕亩？’”（《大诰》）农夫的任务是把地种好，能有好的收获，以此来比喻，他必须把周邦建立起来。这说明他最关心的是现实的政治问题。武庚之乱既平以后，周公封康叔于卫时，向康叔谆谆教导：“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用肇造我区夏越一二邦，以修我西土。”

（《康诰》）这“明德慎罚”四字是周公治国之道的根本原则，其目的在于“保民”、“安民”，也就是保卫周邦于不坠。什么叫“明德”？就是孔子说的“导之以德”，其核心就是“仁政”。由此可以看出，孔子的“德治”、孟子的“仁政”都导源于周公。孟子说“周公仲尼之道”，是合于历史实际的。

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从周公到孔子，他们所关心的都是现实人生问题，从来不谈超现实的所谓天道、鬼神。周公是政治家，当然只谈政治；孔子是思想家，应当多谈些政治以外的问

题，事实上并非如此。他不谈“怪力乱神”，罕言“性与天道”，拒绝回答子路关于鬼神、生死问题，都可以看出孔子重视现实人生问题，轻视超现实的宇宙、自然界问题的态度。

孔子重视现实人生，还有一个特点。他从来不把一个人当作一个独立于人群之外的个人，而是看作一个家庭的成员和一个国的成员，因而有夫妇、父母、兄弟姊妹、子孙等关系，因而又有君臣关系。前者来自父系氏族社会的血缘关系，后者来自建立国家后的政治关系。为了巩固和完善这些关系，必须树立起维持这些关系的伦理，使之不乱，这就是道德。仅有道德观念还不够，还必须维系人与人之间，特别是贵族们之间的行为的规范，这就是礼。既然每一个人都生活于人群之中，不能独立于人与人之间，所以我国古代思想家从来不谈个人自由这类问题。因此我们可以说，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特点有二：一是现实主义的人生哲学；另一是集体主义的社会哲学。自周初到战国，这样的思想占我国思想界的统治地位。战国末期，老庄哲学出，才有人向它提出挑战。

（二）《易大传》与《道德经》

战国以来，百家争鸣之风盛行，儒家后学开始讲天道，用阴阳学说来解释人事，风气为之一变。如《易大传》解乾卦，象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文言曰：“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

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从这些传里我们可以理解，战国时期的儒者已把天看作主宰宇宙一切的最高造物主。《系辞》说得更加明白了，它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太极”是宇宙万物的本源，“两仪”即阴阳，是宇宙万物的表象，阴阳二气贯串着万物，如日为阳，月为阴；昼为阳，夜为阴；男为阳，女为阴，诸如此类。用阴阳可解释一切现象，所以《系辞》又说：“一阴一阳之谓道。”这个“道”和孔子所说的“道”就大不同了。孔子讲的道是“人道”，《易·系辞》讲的道是“天道”。在古代思想史上，从“人道”转向“天道”是一个缓慢的发展过程。《左传》文公十六年，“陨石于宋五”，“六鹗退飞过宋都”，宋襄公问周内史叔兴，主何吉凶，叔兴“退而告人曰：‘君失问，是阴阳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这话是说，阴阳是自然现象，与人的吉凶无关，吉凶由人而不由天。可见在叔兴看来，人道仍然重于天道。又昭公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即大火，心宿二）”，郑裨灶言于子产：“宋、卫、陈、郑将同日火，若我用瓊、珎、玉瓚，郑必不火。”子产不听。次年，宋、卫、陈、郑皆火，裨灶又言，“不用吾言，郑又将火”。子产曰：“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灶焉知天道？”子产不用灶言，“亦不复火”。古代占星学家往往用天象解释人间吉凶祸福，但少数有识之士并不相信。孟子虽言天命，说：“诚者天之道也”（《离娄上》），但他仍重视人事，他力劝梁惠王、齐宣王行仁政，即是明证。至于荀子作《天论》，根本否定天道、天命这些迷信，彻底用唯物的观点解释天人关系，为古代唯物哲学发出耀眼的光辉，这是人所共知的。

《易大传》相传为孔子所作，根据是《论语·述而》篇有这样几句话：“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这是古论，鲁论“易”字作“亦”，属下读。如鲁论所说，则孔子未学《易》，但说孔子“五十以学”，实在不通，今不从）《史记·孔子世家》则说：“孔子晚而喜《易》，韦编三绝”。孔子对学《易》这样用功，何以在《论语》中见不到他劝弟子学《易》的话，而只谈学《诗》、《书》、礼、乐，不大可怪吗？反之，《论语·子路》篇却记着：“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下接“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这后面两句本出《易·恒卦》，前面应有“或曰”二字，当是有人告孔子《易·恒卦》既有此语，何必夸南人之言，而孔子则答以“不占而已矣”，可见孔子是不喜欢占卜的。《孔子世家》的话显然靠不住。更重要的是，《易大传》强调太极、阴阳等天道观，与孔子的只重人道，不谈天道的思想大相径庭，而且如《文言》、《系辞》明言“子曰”，其非孔子自作，不言自明。杜预作《春秋经传集解》，其后序云：“汲郡汲县有发其界内旧冢者，大得古书……有《周易》上下篇，与今正同，别有《阴阳说》，而无象、象、文言、系辞。”可见战国魏襄王时，尚无象、象、文言、系辞诸传，至于序卦、说卦、杂卦则更晚了，可证这些传都与孔子无关。

与《易大传》约略同时出现的还有《道德经》，相传是孔子的先辈老子作的。今人大都否认此说，虽然不能确定作者是谁，但除了极少数人以外，都认为《道德经》的作者绝非相传孔子曾经问礼的老聃。这个看法，我以为是驳不倒的。因为从古代思想发展的源流上来看，《道德经》作者的思想不可能发生在孔子之

前。上文已指出，孔子是现实主义的思想家，他不谈天道，只谈人道，而《道德经》的作者则大谈天道。例如：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第25章）。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天地之母……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第1章）。

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通申，假为神）（第21章）。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当作中）气以为和（第42章）。

从这些话里看，《道德经》作者认为宇宙万物都来源于“道”，它“先天地生”，“可以为天地母”，又说“道法自然”，这是以“道”为宇宙本源的自然哲学。这是我国哲学史最早出现的天道观，亦即自然哲学。

值得注意的是，《道德经》又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道”虽是宇宙万物之母，但它还是“有”，而“有”又生于“无”。这样说来“无”才是宇宙一切万物最原始的形态。这是唯心论的自然哲学。按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的观点，“无”不可能生“有”，宇宙无始无终，所以不可能从“无”生“有”。

《易·系辞》认为宇宙之始名为“太极”，到宋初道士陈抟就提出在“太极”之先还有“无极”，应当说这就是从《道德经》来的

“玄之又玄”的玄学。如果说这样的玄学产生在孔子之前，为什么孔子丝毫未受它的影响？它和谨于守礼的老聃的思想有什么共同之处（庄子书中讲许多老聃的故事和言论都是寓言，并非事实）？

由此可得一结论，讲中国古代哲学史，如仿效古希腊哲学，认为《道德经》的自然哲学产生于孔子的人生哲学以前显然是错误的。

（三）孔学与儒学的异同

一般人称孔子及其门徒的学说为儒学，实际上后世的儒学与孔子学说并不相同。顾颉刚先生曾说过：“各时代有各时代的孔子，即在一个时代中也有种种不同的孔子。”（《古史辨》第2册131页）这话是很对的。因为一个学派总是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变化的，所以到战国时期已“儒分为八”，其中以孟子、荀子两大派为最著。到了汉初，今文学家中的公羊家最盛，而董仲舒又以尊奉公羊学而名重一时。孔子本是尊周的，公羊家硬说他作《春秋》是王鲁；孔子本是一位老儒，公羊家硬推尊他为“素王”，这和孔子思想不是正相反吗？公羊家，特别是董仲舒、何休等所倡导的“通三统”、“张三世”，以及“天人感应”、“阴阳五行”等等说法，这些东西都是孔子从未讲过的。他们打着孔子和儒家的招牌，而贩卖的却是自己的私货，这些能算是儒学吗？西汉末纬书大行，不仅歪曲了孔子的学说，甚至把孔子描绘成一个怪物。东汉末，号称一代经师的郑玄却迷信纬书，说有五方五色

的感生帝是古代圣王之祖的所自出，简直是胡说神话。孔子是一位学者，对古代礼制重视证据，他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论语·八佾》）这说明孔子对于古代礼制，不满足于一般传说，而要取得证据。可惜杞、宋二国未能保存夏、殷二代的文献，证据不足，所以无法引证。孔子对于古代文献如此重视，表明无证不信，而郑玄辈迷信纬书，随意乱说，和孔子相比，不啻天壤之别，怎算得儒家正宗？

魏晋南北朝期间，佛道二教盛行，儒学渐微，唐中叶以后，韩愈作《原道》，以复兴儒学相号召，至宋二程出，朱熹继之，儒学有复兴之象。他们表面排斥佛老，无形中受佛老影响。如朱子作《周易本义》，画河图、洛书图，实本道士陈抟。又说：“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为天，地得之为地，而凡生于天地之间者又各得之以为性。”（《朱文公全集》卷70）这个“理”和《道德经》所谓“道”，黑格尔所谓“绝对精神”又有什么不同？朱熹用“理”字不仅讲人事，而且说宇宙。当然这可算是儒学的新发展，但已非孔学之旧，可名之为朱学。至于陆九渊、王守仁则以“明心见性”为主旨，已变为禅学，离孔学则更远了。

近世海内外有所谓新儒家者，效法西方哲学家在讲堂上纯用思辨之法，高谈自然哲学，由自然而及人事，称之为儒学现代化。虽亦言之成理，但与孔子之学则相去甚远。例如《大学》说：“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此虽汉儒说，但与孔学相近。如不格物，专赖思辨，如黑格尔所谓“绝对精神”，与道家的“无极”，不过都是纯粹的主观空想。《中庸》讲学者求学之法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是最早

的“知行合一”说，这是符合孔子之学的。而西方哲学家则往往知行分离，相去岂不太远？

由此不难看出，自汉武帝用董仲舒之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学变成专制帝王统治人民的工具；而学者们由于利禄所在，多数甘心为统治者作工具。宋儒崇尚理学，提倡“尊天理，灭人欲”，结果理学变为“以理杀人”的封建礼教。毛泽东所说的封建社会的四大绳索实际上都是这班理学家造成的恶果。五四运动中提出“打倒孔家店”的人们，缺乏分析批判的能力，把后世理学家所造成的恶果一概归罪于孔子，这是莫大的错误。

从上面极简略地回顾儒学发展史来看，回答儒学能不能现代化的问题就不难了。从历史上看，各个朝代都有它独特的儒学，也就是说，儒学是经常现代化。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也可以说儒学不能现代化，因为一经现代化，儒学就变了，变得只有面目上的相似，本质上距离孔子学说不知相差有多远了。从现今多数人的观点来看，儒学之所以还能在20世纪和以后在世界思想界占一席之地，而且应当说占重要的一席，不在于后世的“现代化”，而在孔学确有独立不拔而能和西方哲学相较量的地方。我是赞成后者看法的，也就是说孔学能自成体系，独立存在，用不着现代化。如果勉强要把它现代化，反倒成了四不象，等于取消了孔学。本书的目的即在于此。

二 孔子的生平简介

孔子名丘，字仲尼，公元前551（即周灵王二十一年，鲁襄公二十二年）生于鲁国的陬邑（在今山东泗水县东南）。他的先世是宋国的大贵族。周武王灭殷纣王之后，封微子于宋（今河南商丘），宋闵公之子弗父何，让位于其弟厉公，数传之后有孔防叔，传说避难来鲁国，以孔为氏。孔氏来鲁之后当然失掉大贵族的地位，孔子的父亲名叔梁纥（也叫陬叔纥，纥是名，叔是字，陬是邑名），以勇力著名，是鲁国的一名武将。孔子生三岁，叔梁纥就死了。孔子幼年时生活是比较贫穷的。他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论语·子罕》。以下引《论语》只举篇名）

“贱”字表示地位卑下，“鄙事”指劳动人民做的工作。我们知道，孔子生在春秋后期，那时是封建领主贵族专政的时代，不仅政权在他们手里，连教育也把握在他们手里，在这种情况下，孔子既出身微贱，是很难出头的。他在年轻时当过“委吏”（官名），给贵族作管账工作，也当过“乘田”（官名），给贵族管饲养牛羊的工作。但是他非常好学，古书上没有记载过他上过“庠”、“序”一类的贵族学校，他完全是靠自学成功的。他说：“吾十有五

而志于学”（《学而》），“志于学”显然不是说他十五岁才开始读书，而是立志成为一名学者。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从这点上可以看出，他确是非同寻常人。他所说的学，不仅是学书本上的知识，更重要是学如何作人，如何作为“君子”。“君子”一词在古代指贵族，到了孔子之时，它不专指贵族，而又指有道德的人，有治理国家之才的人。从《论语》一书里，不难看出，孔子的政治学是把政治与道德看成不能分开的统一体，“君子”就是治国的人，因此一个“君子”必须是有学问、有道德而能治理国家的人。这个标准是很高的，孔子是怎样自学而达到这标准的呢？他除了读《诗》、《书》，学礼、乐之外，就是从生活中学习。他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述而》），“子入太庙，每事问”（《八佾》）。子贡曰：“夫子焉不学？亦何常师之有”（《子张》）。这些话就是说孔子没有一定的老师，他随时随地都在学。我们看他对学生们说的格言式的话，都是从生活经验中总结出来的，有些格言，不仅在当时是适用的，就在我们今天也还是适用的。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孔子的好学，鲁昭公十七年（前525），邾国（今山东邾城）的国君来朝鲁国，叔孙昭子问他，“少昊氏以鸟名官”是何意义？邾子说，我知道少昊氏是邾国的祖先。他回答很详细。孔子听说此事，“见邾子而问之”，回来告人说：“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左传》昭公十七年），这年孔子二十七岁。这故事说明孔子有机会就去学，正是他学无常师的很好证明。

大约在他三十岁左右的时候，他已经学成，并且开始招收学生，他开创了一种前无古人的职业——讲学。上文说到，在周代

封建贵族专政之时，只有贵族才有受教育的机会，孔子自己就未受过贵族教育，现在他竟能开私人讲学之路，是不是他有超人的本领？不是，这是时代为之。春秋末叶，社会发生变化，给孔子创造了讲学的条件。原来自周初以来，王室往往以土地赏赐给大小贵族，贵族逐渐取得土地所有权，贵族当然自己不会去耕田，而是令农民给他们种田，这就是井田制。井田制的本质不在田成不成井字形，而在于有公田和私田之分。公田是由农民来耕种，把劳动果实献给贵族。《左传》批评鲁宣公十五年（前594）“初税亩”是非礼，理由就是在井田制之下，“谷出不过藉”。《国语·鲁语》也说：“先王制土，藉田以力”。藉字本来是从耕字变化来的，这里训为借，借民力为贵族耕田，这是一种实物地租，当然是对农民的剥削。后来剥削太重了，农民采取对抗办法，只用力在私田上，在公田上则不用力，于是贵族们的所得越来越少，贵族们不满意这种田制，于是采取按亩征税的办法，即打破公田、私田的分界，农民种多少亩田即按此交税，所以名为“税亩”。“初税亩”的实行意味着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以及阶级斗争、贵族内部斗争都激化了，所以《左传》记载各国贵族夺田的事很多。大概税亩的办法自鲁国开始后，很快就普及到东方各国了。加以战争越来越多，农民往往破产，而贵族互斗的结果，打败的多降为庶民或奴仆。结果产生了脱离土地的自由民阶层，其中一部分是没落或破产的贵族，一部分是无地的农民或小手工业者。这种情况为孔子讲学提供了学生的来源。这些人为了生存，也要求学点知识，孔子又实行“有教无类”的原则，不管什么人只要给一点很少的“束脩”（据说是乾肉），就来者不拒，这样学生就多起来了。在他的学生中，贵族很少。大弟子中如颜回、

原宪、季次都是居陋巷，过着一簞食，一瓢饮的苦生活的人。子路、子张都是农民出身，闵子骞穿着芦衣为父推车，仲弓的父亲也是贱人。总之多数学生都是穷苦人，只有子贡是商人，发了财，和贵族们有来往。他擅长外交，“与诸侯分庭抗礼”，这恐怕是孔子学生中唯一的富人了。这些人形成后来战国时期的“士”的阶层。这和孔子讲学有很大的关系。总之，春秋后期社会的剧变，封建贵族的没落等因素促成庶民阶级的觉醒，他们有求知的渴望，这样使孔子私人讲学成为可能；反过来，孔子的讲学，吸收大量庶民成为当时的知识分子，因而到战国时期讲学之风大开，促成著名的“百家争鸣”的局面。

相传孔子有弟子三千人，这显然是夸张，“七十二贤”之说当是事实，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其中年龄相差很大，如子路少孔子八岁，子夏、子游、曾参、子张皆少孔子四十余岁。有父子同受业者，如曾参之父曾点，颜回之父颜路，都是孔子弟子，可见孔子一生都在讲学受徒，这是他的终身之业。

据《论语》所记，孔子教书，主要是《诗》、《书》；教行为规范，主要是礼和乐。至于相传孔子修的《春秋》、作的《易传》、和《孝经》，在《论语》中并无记载。这些书和孔子有无关系成了后人争论的话题，一直到今天还在争论。

孔子在教学过程中，创造出很多宝贵的教育学的原则与方法，如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学思并重，启发式等等，直到今天都是教育学上的宝贵财富。所以他不是一般的教书匠，而是伟大的教育家。

孔子和中国的其它知识分子一样，也关心政治。当时“天下无道”，不仅周天子微弱，“礼乐征伐”不自天子出，甚至不自